

东海先生
作品集
06

余东海 著

春秋精神

儒者的历史随笔

儒眼看历史，褒贬唯良知。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东海先生

①
作
品
集

06

春秋精神

一个儒者的历史随笔

余东海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春秋精神：一个儒者的历史随笔 / 余东海著.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6
ISBN 978-7-5057-3771-6

I. ①春… II. ①余…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7176 号

书名 春秋精神：一个儒者的历史随笔
作者 余东海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 毫米 16 开
14.25 印张 147 千字
版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771-6
定价 3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从江湖“老臬”到《春秋精神》解人

——我眼中的东海先生及其志业

东海先生《春秋精神》一书行将付梓，嘱予作文以序之。我念及先生的性情肝胆，便不揣自己识浅德薄，满口答应下来。此无他，区区诚不足道，却甚愿抱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心，趁此向这位自草莽间走出的儒门大护法道一声辛苦与感佩。正道陵夷，士风销黯，似这般笔挟风雷的特立独行之士真是久违了！

我与东海先生八年前之结缘，乃起于“原道”之网络论坛。值先生广发英雄帖，为令尊征集七旬寿联。余慕其风雅，遂草撰一联为贺，不意获先生之青眼。后蒙先生以诗集《剑魂琴心》相赠，得观其少年哀乐，创业艰辛，感慨系之矣。乃投桃报李，以拙诗集《青史红尘》电子版相寄。先生自此亦屈尊许我为儒友，彼此歌诗唱和，同尊儒道，颇得相知之乐。犹记《剑魂琴心》读后，余曾为一短札，聊抒拳拳之心。文末另撰拙联两副，以表先生之志。其一：“九龙岭下，五指山前，长剑年年呜咽，勒铭耻记千夫长；荆棘丛中，虎狼声里，儒门阵阵弦歌，辟邪幸存百炼钢。”其二：“风雨湿青衫，斯人如今憔悴，壁上龙泉依然啸夜月；英雄悲世路，故国虽在堪惊，

中流砥柱兀自立狂澜。”

对联之文意略嫌悲壮。此亦受先生昔日推倒一世豪杰之沉雄气概所感发。先生早岁曾以“萧瑶”之名畅游诗坛，此间却初步完成由一名自由主义者向儒家信徒的华丽转身，正以“东海一臬”“东海老人”诸名号鏖战于网络江湖，运笔为剑，四面迎敌，辟杨攻墨，直是意兴酣畅，大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概。彼所谓“一臬”者，盖志在不落凡庸，取其桀骜不群之姿也。所谓“老人”者，却又使人想见其沧桑日深、风霜渐染之色。平心而论，先生当时屏幕间嬉笑怒骂之文字，属尘海一流，固足以震慑群顽，然以学术眼光着眼，或据先生今日之学养反观，则未免有诸多可疵议者。简言之，于儒家经典可算造道未深，涵泳未熟，议论未纯。一些概念运用失范，个别文段迹近谩骂，对人物思想之褒贬，尤难免有畸轻畸重之嫌，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此情此景，如许儒家“狂狷”之“狂”，恐犹有未逮。此亦是先生后之为文，不惜披肝沥胆，自陈其非处。至于其新诗《剑魂琴心》一集，虽满纸风动，文辞绚烂，壮怀激烈，然毕竟为其少作，动辄浪迹天涯，佳人美酒，让人不自禁想起武侠说部中的浪子剑客，可谓凌铄有余，沉潜不足，失之浅白。

但我一直以为，先生乃天生勇毅之人，睥睨盎背间，隐然有股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力。这种力量，固有先天之禀赋，亦赖后天之存养，一如孟子所论知言养气，颇难言也。唯此力量体现于立身行志上，则凝结为“不枉到世间走一遭”的勇决。先生与我赠答诗中

有云：“不见文王亦自兴，百年风雪灿孤灯。”外间读之，或不免讥其自视过高，实正先生为常人难以企及处。事实上，有此勇决之气作生命根底，一个人无论读书学剑，皆可有成。相识近十年，东海先生一面借助网络疆场，笔战群雄而愈战愈勇，一面隐遁南宁闹市，埋首群典而层层转深。借用夫子之言，真所谓“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他后来也自述身世曰：“纵横逾十年，论遍海内外，距异端，批戏论，放淫辞，斥邪说，批评众多学者之错误知见，无非为了维护儒家真理、圣贤大义和道统尊严。生命何等珍贵，岂能为逞能耐博虚名而与江湖人士争高低也？况东海丧家犬不如，也无能耐可逞。化用基督徒一言以明志：一切苦难归我，一切荣耀归孔子。”其心其志，高拔如此。

如此一路笔战，一路探寻，先生之著述及论争文字，大言恢弘，小语犀利，早已积之盈篋，又何止数百万言。不少弘论谏言，既关世运，更见直声，却终因多触时忌，屡被屏蔽封锁，恐遽难问世。一些论著则即将收束归编，陆续出版。追原先生之著述流年，大抵可分三个阶段。廿一世纪前，先生曾以团干、记者、教师诸业营生，然时日皆短，可置勿论。后弄潮于商海，为此后潜心学问略聚薄资，然当年情怀所寄，却是仗剑天涯、红袖添香的浪子酒徒诗客。故此时作品，乃以新旧诗词为主。入新世纪以迄2005年一段，先生一度服膺西方民主人权之说，遂以自由主义者立场痛陈时弊，为文多为口诛笔伐、指点江山之政论。此后先生则一尊儒学，折中诸子，大有守死善道，担负尼山家业之概。故其为学为文，乃以指点良知，

护持儒家正法为己任，风雨鸡鸣，一迄于今。

照某些人物传记，吾辈自不妨说，先生由“弱冠”至“不惑”，已是“为学三变”。起初是诗人“萧瑶”，一任生命之挥洒，热血之喷涌，才情之张扬。继之为自由主义者“老泉”，俨然是冲决罗网、补天盗火的民主斗士。三变而成为归于儒门的余东海，自以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故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从此折节发奋，勇猛精进，唯赖一念良知之提撕，在时代风云的翻滚中立稳了脚跟。其间曾私淑新儒家巨擘熊十力先生，收归不羁之心，勇攀向上一路，直接孔孟，回溯六经，经一番穷神知化之功，所操益熟，所得益化，终见得儒家第一义谛。近年来，先生一度仿效“横渠四句”，立“东海四句”以明本志曰：“为自己致良知，为社会致良制，为后世造经典，为时代作标志。”吾于先生，也曾有“儒门百战援夫子，道统千传起大雄”之叹，非言其学道之阶位，乃赞其弘道之勇毅耳。

正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至2010年《大良知学》问世，先生于孔孟之道已可谓登堂入室，立言造论，一派儒家开阖之气象。其后所著《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于儒家王道政治追源溯流，略发筌路蓝缕之力。而去年出版《儒家大智慧》一书，乃有感于世人于儒家应世之学误解良深，故精心结撰，畅述儒家十二种大智慧，文风渐趋平实，义理日臻细密，论说深入浅出，允为儒家大众类图书之翘楚。

本序《春秋精神》一书，乃先生近年读史之笔札。其间资料虽

多出旧籍，然全书一秉夫子“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之理想，重申春秋决狱之精神，为天地立心，向时代发话。与前书相比，文笔尤精湛，义理愈纯熟。其中《正淘汰、逆淘汰和偏统论》一文，以良知与恶习之螺旋斗争为历史脉络，高倡儒家以文化、野蛮二端论华夷之辨理念，纵论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曲折，比并诸朝，折中一是，遂以夏商周汉唐宋为儒家政治之正统，以元明清民（民国）为偏统，中间援引楚汉之争刘邦何以胜出、忽必烈何以儒化诸事例，通篇说理论事宛如水银委地，圆润流畅而一气贯下。鸦片战争以降，清政府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遭遇一系列屈辱与失败，经种种抗争而终于无效之后，作为传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最终被认定为导致民族沦于“亡国灭种”危局之罪魁祸首。此论昌兴百年，流毒无穷，至今犹未肃清。先生特撰《儒家不需要为清朝背黑锅》一文，指出清末之衰乱非尊儒所致，恰恰在尊儒不到位所致。满清之能尊儒，此清王朝初期所以兴隆也，然其满族主义、君本位倾向、民族歧视及文字狱诸节，又严重偏离王道政治，至其中后期尊儒尤失实，故其衰败沦亡也宜。又，今世之人颇羨魏晋之风，爱其清淡超脱之名士风流，盛言“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以为此与泰西之人格自由诸节颇通款曲，实则大谬不然。魏晋诸子生当乱世，佯狂成真，上焉者如竹林一辈人蔑弃礼法，放浪形骸，虽自有可怜可爱之姿，然以儒家中道智慧视之，终不过畸形人格耳；下焉者一味放诞狂浪，醉生梦死，误国误民误苍生，只是一群无心肝之辈，又何风流之有？先生著《儒眼看〈世说〉》一

长文，能于晋人深致之外，洞烛其弊偏，并指示向上之机，一改吾积年对魏晋风度之尊崇膜拜心态也。

为撰此小序，余曾广为搜求阅览东海先生之众文，常为其出入经史、厚积薄发之学养所折服。阅读之余，特注意其文末缀记之年月，深感先生之文，每能后出转精，不少篇什文理饱满、议论允当，不啻为一流佳构，深惜其不能广为流布、觉醒斯民也。而反观诸大报刊，浅谬无聊之说，违心无耻之文却是俯拾即是，宁无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叹！龚定庵有诗云：“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先生救世之药方，固以儒家仁道精神为主药，又何尝自封自闭，视佛道为谬论，视西方自由民主为毒草耶？唯诗中“霜毫掷罢倚天寒”一句，则可谓古今同慨，写尽千古仁人志士有志难申之心境矣。

呜呼！吾至今尚不知先生曾读何等大学，却可断定其学位未及硕、博，更不在教授、博导之列。只缘当初救饥救溺一念炽盛，欲逃无计，欲罢不能，故不恤以匹夫之勇，拔剑起蒿莱，一路宗经征圣，追寇讨贼，如此切磋磨砺凡三十年，终于仁精义熟，直透重关，成了不折不扣的硕博之儒，岂非一学术异人也哉！以此而论，窃以为余先生为今日读书人立了一个典型。试问其不过一介草民，何以能于沧海横流之中，自立自树如此？某在此愿略陈鄙见，既作自我拷问，亦期盼为更年轻之学子，尤其是民间治学之士作一助，并以此求正于余先生本人。如读者诸公观此略有感发，则不负余先生相托为序之雅。

细思先生为学之客观条件，实有常人难以克服之短处。《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想先生半生之为学，纵偶遇知音益友，然绝大部分之岁月，则可谓孤困从学，自为师友。须知此番尘海磨砺，期月可矣，经年不易，数十年如一日更是难上加难，非有坚忍不拔之志，实最易汨没退转。况南宁一地僻处西南边陲，消息闭塞，人文乏弱，远不如域内名都上庠之济济多士，难得师友扶持、相得益彰之便。先生藏书虽多，料亦无法与高校图书馆相提并论。尤为特出者，先生学问乃发迹于网络，其间殊为鱼龙混杂，驳杂浮泛有余，精深理性不足，有时犹不免与一些无聊之徒辩是论非，盘旋既久，虚耗精力口舌。此恐先生向学之初所万难避免者也。故先生大隐隐于市，虽以“德不孤，必有邻”自处，亦终未免形单影只，落落寡合。此类心迹，常流溢于诗文之中，如“浊流猖獗叹斯世，大雅衰微愧此身”“孤灯深入沉沉夜，几度泉声动上苍”之类，皆其深夜孤鸣、凄凉长啸之音也。

然以今日之高校体制弊端论，先生栖身于“体制”之外，亦可谓焉知非福，避过了许多无谓之消耗。与读硕士、博士学生相比，先生不必学政治、习外语，不必修厌恶之课程，不必求各类证书，无考试之摧残，无论文之压力，无求职之焦虑，无诸多冠冕堂皇之管束，故能在思想学术天宇立乎其大，占得主动，随性驰骋。据说某高校博士，毕业论文之后记，感恩戴德者百有余人，试问世故如此，又能做得何学问？与大学教授相比，先生虽不免时生杏林无子之憾，然亦不必于讲台上唇焦舌敝，不必迁就迎合学生（一些高校

让学生为教师打分，而教授中也有担心因对学生督责严格而致其轻生者），不必教改作业，亦无政治学习、填写表格、监考阅卷、论文答辩、会议应酬、课题申报、学生就业、发票报销等诸多尘劳中事，故可以专心致志，直探学问之本真。且夫今日大学教授之间派系林立，有诸多行业规矩，贤者亦难脱其束缚。因为一旦违背此间规矩，必影响到职称之晋升，论文之发表，课题之申报，学科之设立，弟子之毕业，学界之声誉。故教授之间学术观点虽颇不服，然终须一团和气，互给“面子”，直谅之言难见。更多者只就自己专业问题发话，决不论及同行，免生事端。纵有论及，也终未免畏首畏尾，乡愿者众。由于先生“跳出三界外”，无“丢饭碗”之虞，故执笔为文，不必察言观色，庶几做到“我手写我心”，一任良知之兴发，所作之文，自然多有道人所未能道，言人所未敢言者。吾观其网络诸论作，直是上下五千年，东西两半球，无不在其讨论批评之列。即便以弘扬国学者而论，先生又何止批于丹、易中天之属，即便对余英时、汤一介、杜维明辈，亦不假辞色，在义理是非上较一较真章。倘换作体制内学者，后者至少是其师长辈，又焉得直言如此？唯先生有怒中批，有敬中批，其间大有分殊耳。

再从学问重心看，先生治学可谓切中时代之病根，治标治本，直抵腠理。反观一般高校硕士、博士之为学，率多在导师引领下，选取学术一隅以精耕细作，不仅大多无关乎时代之痛痒，其学术园地亦往往愈转愈窄下，不少人毕生不过株守某一专题，或某二三流思想家，于枝枝叶叶间考证搜求，而其一生之求学位、找工作、评

职称、拿课题诸事，尽可托命于此矣。长此以往，则大多精细有余，而通识不足；琐屑有余，而应世不足。彼研究先秦者，问其汉唐，则敬谢不敏；此研究魏晋者，叩其宋明，则浑然莫知。虽曰专精，实则孤陋也。有一类学者，多不肯俯首读书，只是网络高手，粘贴复制多家而成文，却不能通读一卷经，大抵不过为稻粱谋者也；更有一类学者，殊无半点立命立心之念，只唯时潮政策是瞻，以获取重大课题带头人、首席专家、会长、主任、顾问诸头衔为成功，而其一生之最高学术成就，往往即是其成名之作，此亦可悲可叹者也。反思先生学问之途，因无导师之指点，开始不免多费周折，多走弯路，反倒暗合学问“宁低勿高，宁拙勿巧”之训。待其学问修养臻于一定高度后，自亦能融会贯通，直接与圣贤经典相盘桓。其间尤为关键者，乃先生之学术重心，多系由现实病痛逼迫出来，始终由一股忧患意识所催动，故能将学术生命与时代关怀打成一片，汲得源头活水而内外相养，层层转进而生力不歇。余曾读台湾新儒家徐复观、牟宗三诸先生《学术与政治之间》《时代与感受》诸文章，深赏其不但能为高文典册之学术，亦能纵论时弊，高扬士声，尽此士大夫之时代责任。而反观大陆学界，则未免让人太息。此固有历史之因缘，环境之禁锢，不可一味求全责备，然亦有学者自身之原因也。夫以中国之大，学者之众，岂乏高明沉潜之辈？然此类人大多学术地位已定，不免树大招风，以致琐务缠身，无暇为此类文字。亦有少数人系心于名山事业，于象牙塔中“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以追求精纯学术为念，却又不肯直面时弊，捉笔为文。长此以往，

不唯无此心，而实亦无此能也。以此反观，先生散落在诸网站之数千篇论战文字，能够直面时代问题，疏通致远，拨乱反正，自有其唤醒时代人心之价值。其中不少文章痛陈时弊，真是一针见血，虽时过境迁而精义不磨。惜乎这些文字大多在时代之众声喧哗中沉晦网海，问津者稀。

更以文章之思想深度而论，余以为先生已可并轡时贤，出类拔萃。须知当今学问分途已是千门万户，博者易杂乱，精者易偏狭，“刺猬”与“狐狸”不可得兼。先生之文章，量大面广，不仅牵涉人物思想之众多，与社会现实问题亦处处短兵相接，实为今日国学思想界所罕见。故其著文，自不必篇篇精当，一些文章在资料之掌握、义理之分解、概念之辨析，更有不及他人之处。但他一生好学深思，转益多师，于儒家奥义深造自得，真可谓孤军特起，戛戛独造。当今一些学院派学者，亦不乏学殖深厚者，然常年于体制中形成之学术惯性，使其只能诠释前贤，万不敢提出自己学说。唯恐白纸黑字之后，为同行所诟病。而余先生浮沉网海，无此瞻前顾后之虞，故不惜大胆造论，反倒多有创获。如其“仁本主义论”“新中体西用论”“天人感应论”诸说，皆能高屋建瓴，别有洞天，岂真不如那些名教授之核心期刊论文耶？

余撰此序言，不时想起宋代高僧大慧宗杲之言论：“士大夫学道，与我出家儿大不同。出家儿，父母不供甘旨，六亲固已弃离，一瓶一钵，日用应缘处，无许多障道的冤家，一心一意，体究此事而已。士大夫开眼合眼处，无非障道的冤魂。若是个有智慧者，只

就里许做工夫。……打得透，其力胜我出家儿二十倍。何以故？我出家儿在外打入，士大夫在内打出。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内打出者，其力强。强者谓所乖处重，而转处有力；弱者谓所乖处轻，而转处少力。”（《大慧禅师语录》）余先生学儒，譬如“士大夫”，而博士教授学儒，则较多近于“出家儿”。他是在尘世纷争之中摸爬滚打一过，上下求索之后自归儒道，故能信心十足。而一般博士教授之研究儒学，则以“知”为主，视儒学为一专业研究方向，虽对儒家有亲近之念，但其志不艰，其情不厚，故其行动亦乏力；而余先生则以“信”为主，以“知”辅“信”，儒家义理对其沦浹肌髓，浸润生命里层，发之为文后，倍觉深沉有力量。

人生于天地间，各各皆有一不断生成之“生存世界”。此世界关乎信仰、苦难、担当、情感、才学与性情，是为人之生命底色与力量源泉。余以为，著名诗人刘梦芙先生颇能道破余先生的“生存世界”：

诗思如潮水。任毫端、奔江泻海，已逾纲纪。块垒胸间凭一吐，岂效簪花姿媚。廿四史、兴亡谁记？莽莽中原观逐鹿，灭前王又建新王邸。尧舜德，僭称美。梦醒犹卧槐柯里。最堪悲、群蒙难悟，圣贤深意。百载师夷安用夏，空洒吾儒老泪。淬血火、炼成文字。夜色沉沉霾雾重，瞩天东明月何时起？光隐约，在渊底。（《金缕曲——六迭叶嘉莹先生韵寄东海》）

词气沉郁顿挫，寄意遥深，感人肺腑。其中“百载师夷安用夏，空洒吾儒老泪”一语，最为沉着，当可概括先生之“生存世界”。但我坚信，东海先生立足民间，以毕生心力为儒家招魂之悲愿，天必佑之，决不会老泪空洒。因为真理不磨，神州崛起，有赖此儒道重光。

近几年，先生喜“微言”，盖取其简明扼要故也。吾曾于某集微言之后，撰写数行赞佩之辞，或差可概括先生之志业。

决孔孟之滥觞，洙泗奔流；昭汉唐之遗烈，长乐未央；揽佛老之别境，洞见良知；继宋明之绝学，纵贯天人；汲科学与民主，经权以时；破百年之迷惘，直指人心。先生之微言，或有时而可商；先生之胸襟，真正正而堂堂；无文王亦自兴，抗流俗成孤往；舍浮槎以弘道，因悲悯而担当；哀此生之须臾，恨中道其未光。有斯人生斯世，且记之慎勿忘！

这些称颂文字，未解者还道是肉麻吹捧。我却愿公之于众，甘受世人之讥。尤望余先生勿负此儒门志业，终日乾乾，无愧于这一大事因缘。

乙未年冬日

孙齐鲁

谨识于清远燕知堂

目 录

从江湖“老泉”到《春秋精神》解人	1
历史是由儒家写的	1
尊重言论权是儒家的优良传统	5
正淘汰、逆淘汰和偏统论	23
仁者无敌	38
伟大的帝王师	43
儒家的土地所有制	58
谈谈电影《赵氏孤儿》	64
扎紧嘴巴沉住气	68
没有学问将不了军	72
汉初政治论	76
对夷狄也要讲信义	87
死还是不死，是一个问题	92

百万大军一笑摧	96
失言的后果	100
为酷吏辩小诬	104
为宇文泰与苏绰辩诬	109
罪恶没有赢家	116
宋朝官场清廉度秦后最高	120
为朱熹洗冤	126
儒家对西方的历史影响	134
忽必烈儒化：一次华丽的历史转身	141
一生低首拜阳明	153
儒家不需要为清朝背黑锅	179
向日本索赔	187
附：“二十四孝”批判（微集）	200
附：黎文生序 广传仁音 同致大良知	204